政 大 史 粹 第 六 期
2004年6月，頁61-94


# 日治時期台灣「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形成與進行(1936-1945)

戴振豐*

摘　要

「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是日治時期新的時間制度下，日本在台灣所安排的日本式節慶。

建國祭又稱為紀元節，其日期是在2月11日，是日本慶祝其建國的日子。日本在台灣日常行事中的紀元節，會舉行建國祭，在建國祭中，原本並沒有建國祭愛馬大行進這個項目，但自從日本進入中日戰爭之後，為配合日本第一次馬政計畫而實施的馬的生產及獎勵的措施，以及為了普及台灣民眾對於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的思想，從1939年開始在建國祭中加入了愛馬大行進的項目。

愛馬日是在每年的4月7日。為何日本要實施愛馬日，這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37年(1904年)，當時因為日本在甲午(日清)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班三年級。

和日俄(日露)戰爭之後，深覺馬在戰場上有其重要性，因此從明治37年4月7日開始實施愛馬日。愛馬日實施之後，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日本開始了第一次三十年的馬政計畫。愛馬日在台灣做為日本馬匹改良計劃的一部份，在二次大戰之前並沒有充分的運用，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隨著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推行，愛馬日乃成為其運動的一部份，做為全國的愛馬日，在日本競馬會、帝國馬匹協會、日本協馬協會的提倡，以及在軍、文部、農林各省、國民精神中央聯盟的後援之下，從昭和14年(1939年)4月7日起開始盛大實施。

軍馬祭的實施是為了祭祀在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中犧牲的軍馬。在日本內地是從昭和13年(1938年)開始，由帝國馬匹協會、日本競馬會、大日本騎道會、軍用馬匹鍛鍊中央會主辦了第一回軍馬祭。昭和14年(1939年)，則舉辦了第二回軍馬祭，而台灣在日本內地的影響之下，這年的10月24日開始也實施了台灣第一回的軍馬祭，由各州廳畜產會負責主辦。這三個在日治時期台灣的紀念日，是否有進一步的意義，將於結論部份以後殖民理論的看法來詮釋。

關鍵字：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軍馬祭、後殖民

C.E.P.S.

## 一、 前言

薩依德在其《東方主義》這本書中，探討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家及人民，如何形塑了關於東方的印象及看法，並進而批判了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誤解。而在《東方主義》之後，薩依德的另一本鉅作《文化與帝國主義》則是延續其對西方霸權的又一批判之作，這本書精心構築了西方帝國之野心與其文化之間的戲劇性的關聯，他以十九、二十世紀的小說敘事爲分析對象，從艾略特、康拉德開始，一一檢視了葉慈、阿契比、魯西迪等作家的作品，以顯示被支配的臣民如何產生屬於他們自己的反對與抗拒之充滿盎然生機的文化，其重點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威權及其餘緒加以鋪陳，顯出帝國主義作爲普遍的文化領域，充斥著特殊的政治、意識型態、經濟、社會力道[1]，並在那些受殖民主義控制的地區進行知識編碼和製造。

在薩依德的思想啓發之下，筆者也擬從文化層面重新檢視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歷史過程，並進而探討日本的帝國主義作爲普遍的文化領域，在殖民地如何形塑台灣人民對殖民母國的知識編碼和製造，並從而探討此文化領域所隱藏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

在上述關於後殖民的意識形態之下，筆者選擇了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所推行的官方紀念日「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爲例，做爲探討的主題。至於爲何會以「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爲例，主要是延續了筆者之前關於賽馬的研究，亦即做爲日本殖民

---

[1] 引自Edward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板橋：立緒文化，2001年，初版)，內頁的簡介。

C.E.P.S.

地的台灣，台灣總督府關於馬的生產及獎勵的措施，是做爲日本第一次馬政計畫的一部份來實施的，而對於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思想的普及，一般認爲賽馬具有正面的功用[2]。事實上，日本政府對於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思想的普及，還利用官方紀念日的方式，一方面選定一天祭祀爲戰爭犧牲的戰馬，一方面設置了「愛馬日」，舉辦愛馬遊行等相關活動，並且在官方紀念日的建國祭，舉辦了愛馬行進，這三個關於馬事思想普及的活動，都動員了許多的民眾參與，本文即是欲透過這三個紀念日當中關於愛馬活動的研究，重新探討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意義。

在研究方法上，透過敘述「軍馬祭」、「愛馬日」及「建國祭愛馬行進」的過程，呈現在文化層面上，日本如何表現出其帝國主義的手段、方法及其意識形態，以及台灣人民的文化知識如何被編碼與製造。本文並非全面探討在日治下台灣所有官方的紀念日，而是透過與馬事思想的普及有關的紀念日，也就是以一種關於文化個案的研究，來顯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一種後殖民意義。

至於本文的研究概況，首先在後殖民理論的研究概況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薩依德的論點之外，關於西方後殖民理論的成果已經相當豐碩，筆者選讀了一些翻譯的作品，如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

[2] 請參閱戴振豐著，〈日治時期台灣賽馬的沿革〉，《台灣歷史學會通訊》，第十六期，頁1-17。

C.E.P.S.

叢編委會編的《解殖與民族主義》[3]，以及(美)賽義德（即 Edward Said）等著、陳永國等翻譯的《後殖民主義與文化理論》[4]這二本書選譯了一些西方以及第三世界著名的後殖民理論學者的作品，包括了薩依德、敏米(Albert Memmi)、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岩淵功(Koichi Iwabuchi)、法農(Frants Fanon)等等。這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建構了後殖民的理論，如殖民者與受殖者之間的關係、受殖者的意象如何轉移、後殖情境下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後殖民下原殖民者的受殖民的矛盾關係，以及其與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等等。以上這些理論性的著作是本文結論論述上理論運用的基本來源。另外，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的一些學者，也有一些關於後殖民的論著，如張京媛所編的是選自大陸(如張京媛、劉禾)、香港(如洛楓、鄭恆雄)及台灣(如邱貴芬、廖咸浩)的一些學者的著作[5]，而單獨的作品則有大陸的陶東風的《後殖民主義》和台灣盧建榮所寫《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1950-2000》[6]可爲代表，而這些論著基本則是西方後殖民理論影響的實務作品。

---

[3]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

[4] (美)賽義德（Edward Said）等著、陳永國等譯，《後殖民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

[5] 張京媛著，《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初版)。

[6] 盧建榮著，《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初版)。

其次，關於紀念日的研究成果上，張瑞德的〈紀念與政治〉[7]及呂紹理的〈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8]可爲代表。張瑞德的〈紀念與政治〉一文，探討台海兩岸官方關於紀念日的政治運用，並且比較兩岸之間的差異，此種紀念日與政治關係的研究途徑，對本文具有實際參考作用。呂紹理的〈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一文，其主旨是在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如何形成，以及此一休閒生活有何商業機制來加以服務。而其在論述日本殖民政府爲了要在台灣塑造一個合於日本生活節奏的環境，因此在統治之初，改動了既有的社會韻動，這種改變包括了兩種新的時間制度，一是陽曆以及在陽曆曆年下所安排的日本式節慶，二是「星期」的生活循環單位，這兩種時間制度使台灣社會的節日增多，是台灣休閒社會出現的契機。其中日本式的節慶，即爲本文官方紀念日的一種。

第三，本文研究的重點「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都以遊行的活動爲主要的形式，因此關於遊行的概念性研究，在此僅舉出瑪琍・萊恩(Mary Ryan)的〈美式的遊行：十九世紀社會各界的再現〉[9]一文爲例，此文是探討遊行在美國所發展出來獨特的型態，包括遊行在城

---

[7] 張瑞德著，〈紀念與政治〉，盧建榮主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初版)，頁149-206。

[8] 呂紹理著，〈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未刊稿。

[9] 瑪琍・萊恩(Mary Ryan)的〈美式的遊行：十九世紀社會各界的再現〉，林・享特(Lynn Hunt)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初版)選文之一。

市中的路線(都會文化的形構)、美國各個族群的遊行團體所形成的社會認同等等，此種遊行與本文主旨「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中的遊行活動，形成明顯的對比。

最後，由於日本統治台灣後期，適逢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而「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也在此時期才出現在文獻的記載，此種官方活動的發起是否與戰爭的動員體系有關，也是值得探討問題。戰爭的動員的研究，可以林繼文的《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10]，以及江智浩著，《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11]這二本書爲代表。

本文的研究架構，訂定如下：

一、前言

二、「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形成

1. 日常生活中的行事
2. 戰爭動員體系上馬事思想的普及

三、「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進行

1. 建國祭愛馬行進
2. 愛馬日

---

[10] 林繼文著，《日本據台末期： (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台北縣：稻鄉，民85，初版)。

[11] 江智浩著，《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桃園縣中壢市：撰者，民86年，初版)。

C.E.P.S.

3. 軍馬祭

四、結論

各節論述重點是：一、前言，介紹本文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研究概況及研究架構。二、「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形成，這部份是要探討「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形成的原因。包括了從日本統治者在台灣欲建立的日常生活行事，以及爲因應日本本身發動的戰爭動員體系兩方面，來探討其形成的原因。三、「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進行。本節探討這三個紀念日當中，其在台灣進行的實際情況。四、結論。本文所探討的「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這三個紀念日，我們若視其爲一文化現象，筆者將嘗試探討這三個節日所顯示出來的殖民操作，是否如符合後殖民理論學者的看法，如薩依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日本是否在殖民地進行知識編碼和製造；亦或如敏米認爲的殖民者對受殖者，雖然有使殖民者與其同化的相關措施，但基於殖民的本質，同化必歸失敗的情況。

## 二、「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形成

### (一)日常生活中的行事

在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過程當中，其中一項重要的措施是要建立起穩定的社會秩序。爲了建立在台灣的社會秩序，日本統治台灣的過程首先歷經了武裝鎮壓，其後建立特殊的「六三法」及「三一法」的「六三法體制」，1921 年通過的「法三號」則是朝向「內地延長主義」及「同化

政策」，最後在 1937 年開始的「皇民化運動」，則是要將台灣納入如同日本內地的生活秩序。

要將台灣納入日本的生活秩序當中，其中一項是關於日常生活行事的措施，這方面呂紹理的《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12]一書，即是探討日本如何在台灣形成一套新的時間制度。另外，在〈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一文中更進一步探討了新的時間制度與台灣休閒生活形成的關係，呂在這篇文章中的看法是，在傳統台灣社會中，社會生活的韻律是依循著自然規律而形成的，傳統的歲時祭儀多半關聯著節氣的變動，或者關聯著民間信仰的活動。但是在日治時期，整個社會生活卻有了很大的變動，日本殖民政府爲了要在台灣塑造一個合於日本生活節奏的環境，因此在統治之初，改動了既有的社會韻動。我們如果從年、月、週、日等不同的時間單位來觀察，則可以發現，日治時期加入了兩種新的時間制度，一是陽曆以及在陽曆曆年下所安排的日本式節慶，二是「星期」的生活循環單位，在此一節日安排下，日治時期的台灣比傳統時期多了十三個放假天，這些節日表列如下。

| 祝祭日名稱 | 1928年前 | 祝祭日名稱 | 1928年前 |
|---|---|---|---|
| 四方拜[a] | 1月1日 | 天長節[c] | 8月31日 |
| 元始祭 | 1月3日 | 秋季皇靈祭 | 9月24日 |
| 新年宴會 | 1月5日 | 神嘗祭 | 10月17日 |
| 紀元節 | 2月11日 | 台灣神社祭 | 10月28日 |

[12] 呂紹理著，《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年，初版)。

C.E.P.S.

| | | | |
|---|---|---|---|
| 春季皇靈祭 | 3月21日 | 天長節祝日 | 10月31日 |
| 神武天皇祭 | 4月3日 | 新嘗祭 | 11月23日 |
| 台灣始政紀念日 | 6月17日 | 大正天皇祭 | 12月25日 |
| 明治天皇祭(b) | 7月30日 | | |

說明：(a)1919年後改稱元旦祭；(b)1929年後改稱明治節；(c)1929年後改為4月29日。表中劃底線之日不放假，但要舉行儀式。

資料來源：1914～1936 年各年《台灣民曆》。[13]

「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即是日治時期新的時間制度下，日本在台灣所安排的日本式節慶。在上述日本在台灣建構的日常生活行事當中，建國祭就是上表中的紀元節，是在每年的 2 月 11 日，在建國祭中，原本並沒有建國祭愛馬大行進這個項目，自從日本進入中日戰爭的體制之後，爲配合日本第一次馬政計畫而實施關於馬的生產及獎勵的措施，以及爲了普及台灣民眾對於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的思想，從昭和 14 年(1939 年)開始在建國祭中加入了愛馬大行進的項目。

而「愛馬日」、「軍馬祭」並沒有列在上表中，這是因爲上列表中的資料只到 1936 年，而愛馬日是從昭和 14 年(1939 年)的 4 月 7 日開始擴大實施。軍馬祭則是從昭和 14 年(1939 年)10 月 24 日起，爲祭祀在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犧牲的軍馬而開始實施的[14]。

[13] 呂紹理著，〈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未刊稿，頁2-3。

[14] 台灣畜產會，〈軍馬祭〉，《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8年第十一號，(台北：台灣畜產會，昭和18年)，頁50。

## (二)戰爭動員體系下馬事思想的普及

日本統治台灣殖民政策的的演變，大約是從「無方針主義」，到「同化主義」，再由揭櫫「內地延長主義」，進而強調「皇民化政策」。「無方針主義」的統治時期，大致從 1895 年到 1918 年左右；「同化主義」則約從 1918 年明石元二郎總督明揭同化主義爲施政方針開始；到了 1919 年原敬內閣重提內地延長主義，同年任命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遂在台灣實行內地延長主義；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爲使台人亦具有日本國民之愛國心和犧牲精神，因此有「皇民化運動」的提倡。

在皇民化運動的提倡之下，馬的生產改良與獎勵及「馬事」思想的普及，做爲翼贊其戰爭的一部份，亦在台灣擴大推展。日本本國關於「馬事」思想的提倡，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 27 年(1894 年)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政府認識到其國內馬匹素質有改善的必要，乃在戰後開始著手馬種的改良增殖。在尚未收到實際的成效之際，在 1900 年及 1904 年又碰到八國聯軍(北清事變)及日俄戰爭，更加曝露了其軍馬的劣等，因此在日俄戰爭之際曾仰賴了澳洲約一萬匹的良馬，而在戰後朝野乃發起了馬匹的改良促進運動。終於在明治 39 年(1906 年)，日本政府在其內閣新設了馬政局，主管馬匹的改良蕃殖及其他相關的馬政事務，並且開始了第一次三十年的馬政計畫[15]。

而早在日本推行馬政計劃之前的的明治 37 年，也早已定訂 4 月 7 日

---

[15] 福井蹄枕著，〈馬の蕃殖と育成〉，《台灣之畜產》，昭和12年第六號，頁2。

C.E.P.S.

爲愛馬日，做爲提倡馬事思想的紀念日。另外，爲了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思想的普及，一般認爲賽馬具有正面的功用，因此在日本內地乃有大正 12 年(1923 年)的賽馬法及在昭和 2 年(1927 年)的地方賽馬規則，而台灣的有識之士有鑑於此，從昭和 3 年開始也在台灣發起了賽馬的運動[16]。

到了 1931 年(昭和 6 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7 年又因盧溝橋事變(支那事變)，開始與中國長達八年的中日戰爭，這就是日本史上所謂的十五年戰爭時期。在當時的戰爭過程當中，軍馬在戰場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關於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思想的普及，乃做爲戰爭體制中的一環而成爲官方施行的項目之一。

在台灣，除了有官方提倡的馬匹養殖與品種改良，以及由民間主辦的賽馬活動之外，在支那事變之後，隨著日本進入中日戰爭，對於馬事思想的普及的推行，有益加擴張的趨勢。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除了將台灣帶入皇民化政策之外，並且於 1937 年 9 月頒佈了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及本部規程，同月召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的參與會，決定本運動具體的實施事項，此外並在各州廳成立支部、郡市設立支會以及在各街庄設立分會。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本部設在總督府內，設有部長、副部長、參與及部附等職，部長由總督府總務長官擔任，副部長由文教局局長擔任，參與及部附則由台灣總督任命。至於地方各支部方面，則由各地方官廳自行訂定，並沒有統一的規

[16] 請參閱戴振豐著，〈日治時期台灣賽馬的沿革〉，《台灣歷史學會會訊》，第16期，2003年5月。

C.E.P.S.

定[17]。另外，爲因應長期戰爭及確立國防經濟體制之需要，於 1938 年頒佈了「國家總員法」，台灣在該法的籠罩之下全面進入了「戰時體制」[18]。

隨著逐漸擴展至武力南進的局面，日本國內於 1940 年 7 月 22 日所成立的第二次近衛內閣，提出了以「國民組織」爲主體的新體制運動。台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也隨之召開參與會，針對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組織及實踐項目進行再檢討，各地方支部也因應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再出發」，針對既有的組織加以擴充與整編，不過各地方支部組織的更動並不完全相同[19]。

整個台灣戰時動員體系的建立，最後是統一在皇民奉公會之下。隨著 1940 年 10 月日本國內成立大政翼贊會，台灣到了 1941 年，以內地大政翼贊會爲主體，在 4 月 19 日成立「皇民奉公會」，總裁由台灣總督擔任，各州支部長均由各州知事擔任，下部組織也與地方行政組織一致。1942 年 7 月呼應內地大政翼贊會的改組，皇民奉公會也在組織上做了調整，其首要工作是整合當時各種國民組織與運動團體，全部歸納在皇民奉公會之下，使國民運動一元化。因此，所有的教育會、教化聯合會、聯合青年團

---

[17] 江智浩著，《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頁40-41。

[18]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9月，初版)，頁179。

[19] 江智浩著，《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頁42。

C.E.P.S.

或國民精神總動員支會等皆廢止，統一納入皇民奉公會之中[20]。

整個中日戰爭後台灣的戰爭動員體系，是接續戰前日本在台灣因社會教化而設立的各種地方組織團體，一直到國民精神總動員以及皇民奉民會成立，是日本在同化主義、內地延長主義及皇民化政策之下，除了要製造台灣人的日本意識之外，又再加上戰爭意識的培養。

戰爭意識的培養在國民精神總動員及皇民奉公會時期，從本部到各地支部均有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如研究會、講習會、演講、祈願祭、各種式典、協議會、展覽會、以及各種名目的週間及特定日的設定等等。本文所討論的「馬事」思想，就是做爲戰爭意識培養的一環而出現的，並且在一年之中有三次關於「馬」的日常生活行事，即 2 月 11 日的建國祭愛馬大行進、4 月 7 日的愛馬日及 10 日 24 日的軍馬祭，其中建國祭愛馬大行進，著重在紀元節祭祀後的遊行活動，而軍馬祭則以祭祝活動爲主，搭配廣播、印制物等宣傳活動，對「馬事」思想而言均是較單純的活動。而完全以「馬」爲主題，並廣泛透過各種的形式加以宣傳，主要是愛馬日的慶祝活動。

日治時期台灣人民日常生活行事中的「馬」，即日本在台灣所推行的「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這三個節日在 1937 年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之後，台灣人民每年在 2 月 11 日、4 月 7 日及

[20] 鄭麗玲著，《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新竹市：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一般史組，民83)，頁52-55。

C.E.P.S.

10 月 24 日，在年中行事中多加三件「馬事」，這些都是官方爲戰爭所推行的馬事思想，並且是做爲在戰爭動員體制下國民精神總動員的一環而實施的。

## 三、「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進行

### (一)建國祭愛馬行進

建國祭又稱爲紀元節，其日期是在 2 月 11 日，是日本爲慶祝其建國的日子。日本在台灣日常行事中的紀元節，會舉行建國祭，在建國祭中，原本並沒有建國祭愛馬大行進這個項目，但自從日本進入中日戰爭之後，爲配合日本第一次馬政計畫而實施的馬的生產及獎勵的措施，以及爲了普及台灣民眾對於馬匹品種的改良及馬事的思想，從 1939 年開始在建國祭中加入了愛馬大行進的項目[21]。

建國祭是在紀元節舉行的，其日期是在 2 月 11 日，是日本慶祝其建國的日子。日本在台灣日常行事中的紀元節會舉行建國祭，在建國祭舉行的活動當中，原本並沒有建國祭愛馬大行進這個項目，但因中日戰爭的爆發，而加入這個項目，在昭和 14 年建國祭的前一天 2 月 10 日，台灣軍的參謀長大津和郎透過台北放送局，向全島說明舉行建國祭愛馬行進的原因，就是要感激從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以來，與將士一起艱難辛苦而犧

[21] 〈建國祭愛馬行進ニ因シテ〉，《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4年第二號，頁1-5。

C.E.P.S.

牲的軍馬。並說明 2 月 11 日的建國祭，由各州廳主辦，在午後由軍、官、民互相協力之下，進行馬的市街集團行進，並且高唱陸軍省選定的「愛馬進軍歌」[22]。2 月 11 日是日本皇紀二千五百九十九年的紀元節，在慰勞出征軍馬的勞苦、普及馬事思想及養成愛馬觀念的主旨下，各州廳均舉辦了愛馬大行進[23]。

昭和 15 年 2 月 11 日的紀元節，是日本皇紀二千六百年的紀念日，本年的紀元節建國祭更加盛大舉行。台北州畜產會主辦的奉祝愛馬大行進，參加的有在北部隊、武德會馬術部、州團馬術部、大稻程愛馬會、台灣學生馬術部聯盟、台北少年乘馬練習所、台北州役馬利用講習所，等官民諸團體，共約五百頭馬在南門附近集結，午後一時由音樂隊領頭在樞要街路行進，至午後五時抵達終點建功神社[24]。

台中市的愛馬大行進定有實施計劃，包括主旨是加深對馬的認識及涵養對馬愛護的觀念。由台北州畜產會主辦，由總督府、台灣畜產會後援，

---

[22] 〈建國祭愛馬行進二因シテ〉，《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4年第二號，頁1-5。

[23] 〈各州廳主催愛大行進〉，〈建國祭愛馬大行進散見(台北州)〉，〈建國祭愛馬大行進概況(新竹州)〉，〈建國祭愛馬大行進實施概況(台中州)〉，〈建國祭愛馬行進テ(台南州)〉，〈建國祭愛馬行進實施概況(高雄州)〉，〈建國祭愛馬行進實施概況(花蓮港廳)〉，《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4年第二號，頁113-123。

[24] 〈台北市に於ける奉祝愛馬大行進〉，《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5年第三號，頁68。

C.E.P.S.

參加的範圍有台中州畜產會乘馬練習所、及其台中市支會和大屯郡支會，參加的頭數約六十頭，集合場所在台中州畜產會乘馬練習所，時間在 2 月 11 日午後一時出發，行進經路高砂町、老松町、明治町、旭町、台中醫院前、州廳前通、大正橋、台中驛前、驛前大通、梅枝町、若松町、台中神社，最後回到乘馬練習所。休憩所在台中醫院及梅枝町二個地方[25]。

台南市的愛馬行進概況是由台南州及台南州畜產會主辦，及由台灣軍及台灣總督府後援，行進參加人馬有台南井之上部隊、台南憲兵分隊、台南管內農馬及飼養者、新豐郡管內農馬及飼養者、台南州畜產會乘馬練習所及其他乘馬員、台南荷馬車組合馬及飼養者、台南農業學校生及畜產關係職員等[26]。

高雄州下愛馬大行進概況，是由高雄州畜產會主辦，高雄州、高雄要塞司令部、高雄憲兵部、高雄市馬事普及會爲後援，參加團體有高雄州、高雄要塞司令部、高雄憲兵部、高雄市馬事普及會等民間等團體，共三十六頭參加。行進概況是在 2 月 11 日午後一時，在高雄神社舉行建國祭之後，一時四十分由乘馬隊先導，從高雄神社出發，依次是樂隊、小公學校、少年團、女學校、徒弟養成所、商工專修學校、中學校、青年學校、在鄉軍人、消防組、壯丁團、青年團、一般官衙、銀行、會社、組合、工場、

---

[25] 〈台中市に於ける建國祭奉祝行事〉，《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5年第三號，頁68-69。

[26] 〈台南市に於ける建國祭愛馬行概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5年第三號，頁70-71。

C.E.P.S.

婦人團體、各區民團、市役所團等，各種奉祝小旗及大旗，並吹奏愛馬進軍歌，在市內各大道行進，最後在州廳前一齊奉祝萬歲三聲，於三時四十分解散。解散後乘馬隊及愛馬人士舉辦懇談會，以圖馬事思想的普及。

屏東市也有舉行愛馬行進，屏東市各郡役所下的馬匹參加各神社的參拜後，在市內行進，最後在市役所及郡役所前高呼萬歲後解散。解散後在各市郡馬事普及會馬場集合，召開飼養管理上的對照及涵養愛馬精神的座談會[27]。

台東的愛馬大行進，由台東廳畜產會主辦，共有 26 人馬參加，行進狀況是在午後一時由台東神社集合，向戰歿將兵及軍馬默哀一分鐘，畜產會代理會長合屋技師說明行進的旨趣後，開始出發行進繞巡市內一週，至卑南公學校休息，四時半再出發繞巡市內一週至神社前，高呼萬歲後解散。此次的行進對馬事思想的普及收到很大的效果[28]。

花蓮港廳的愛馬大行進，參加者有花蓮港種馬所神谷技手，郡職名、郡守、處務課長外二名，林曰馬產組合長外組合員二十九名，鳳林街貸付馬所有者四名，參加馬數有三十九頭，2 月 11 日午後二時出發，先向神社參拜，經林田道路、市內道路、鳳林公學校、南崗部落、派出所，最後至鍛鍊場後結束[29]。

---

[27] 〈高雄州に於ける奉祝愛馬大行進概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5年第三號，頁71-72。

[28] 〈台東街に於ける奉祝愛馬大行進概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5年第三號，頁72。

[29] 〈花蓮港廳に於ける建國祭奉祝愛馬大行進實施概況〉，《台灣畜產會會

昭和 16 年 2 月 11 日，同樣舉行了建國祭愛馬大行進，台北市在州畜產會主辦，及總督府、台灣軍、台灣畜產會及台北市的後援下，共二百五十四頭馬匹參加。台灣其他各州廳畜產會同樣舉行了愛馬大行進[30]。

昭和 17 年不知何故，不見建國祭的記載，不過至昭和 18 年，在台南州下才又見到建國祭第二回騎道大會的記載[31]，不過這是屬於馬術的競技，與前述的愛馬大行進不同。

### (二) 愛馬日

愛馬日是在每年的 4 月 7 日。爲何日本要實施愛馬日，這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 37 年(1904 年)，當時因爲日本在甲午(日清)和日俄(日露)戰爭之後，深覺馬在戰場上有其重要性，因此在樞密顧問官、內閣諸公和元帥的建議之下，從明治 37 年 4 月 7 日開始實施愛馬日。愛馬日實施之後，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日本政府在其內閣新設了馬政局，主管馬匹的改良繁殖及其他相關的馬政事務，並且開始了第一次三十年的馬政計畫[32]。

---

報》，昭和15年第三號，頁73。

[30] 〈建國祭愛馬大行進概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6年第三號，頁66。

[31] 〈建國祭第二回騎道大會〉，《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8年第四號，頁127-130。

[32] 福井蹄枕著，〈馬の蕃殖と育成〉，《台灣之畜產》，昭和12年第六號，(台北：台灣畜產協會，昭和12年)，頁2。

C.E.P.S.

愛馬日在台灣做爲日本馬匹改良計劃的一部份，在二次大戰之前並沒有充分的運用，直到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隨著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推行，愛馬日乃成爲其運動的一部份。做爲全國的愛馬日，在日本競馬會、帝國馬匹協會、日本協馬協會的提倡，以及在軍、文部、農林各省、國民精神中央聯盟的後援之下，從昭和 14 年(1939 年)開始盛大實施[33]。

愛馬日的活動，比起建國祭愛馬大行進及軍馬祭，其內容可說是更加多采多姿，從昭和 14 年的第一回愛馬日，一直到有資料記載的昭和 18 年(1943 年)的第五回愛馬日，其內容一年比一年豐富，計劃一年比一年完備，因此僅介紹昭和 18 年的愛馬日各地相關的行事。

首先，在 4 月 7 日的愛馬日當天愛馬行進是其中一項重要的項目，其愛馬行進的方式與建國祭大同小異，茲舉昭和 18 年台北州的概況爲例：

台北州的愛馬行進，參加的團體有台灣軍、台灣學生馬術聯盟、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本部騎道部、台北州畜產會少年乘馬練習所、大稻埕愛馬會、台北乘馬俱樂部、台北州役馬利用講習所。實施時間在 4 月 7 日早上 8 時，集合地點在東門與南門之間，8 點半出發，經海軍武官府前、敕使街道北進台灣神社(護國神社遙拜)、陸軍墓地前、太平國民學校前太平町南進、通過北門、京町荒井商店、憲兵隊、榮町通新高堂、總督府、軍司令部、植物園、最後到建功神社參拜後解散。各隊伍行進的順序是台灣軍、台灣學生馬術聯盟、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本部騎道部、台北州畜產會少年乘

[33] 〈愛馬の日を四月七日定めたる由來〉，《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4年第六號，頁103-104。

馬練習所、大稻埕愛馬會、台北乘馬俱樂部、台北州役馬利用講習所。中途休息的地方在太平國民學校、憲兵隊前，並有大日本婦人會來做愛馬服務。總指揮官由軍方指派。除台灣軍之外，各團體行進須持團體旗幟，由主辦單位準備[34]。

除了愛馬行進之外，昭和 18 年 4 月 6 日以及 4 月 7 日晚上，即愛馬日的前一日及愛馬日當天，台灣軍獸醫部長鈴木清氏及台灣總督府技師高澤壽氏，分別透過台北放送局以「愛馬日」及「台灣與馬產」爲題，向全島廣播聖戰下馬的重要性[35]。1943 年在決戰下馬產強化的方針之下，4 月 7 日台北州愛馬日的行事內容，及負責擔當的機關如下表所示：[36]

| 區分 | 內容 | 擔當機關 | 關係機關 | 摘要 |
|---|---|---|---|---|
| 講演會、講話會及其他 | 講演談話。可與電影、音樂舞蹈合併舉行 | 各州廳畜產會 | 軍<br>各州廳皇奉支部 | 依各市郡單位實施 |
| 神社參拜 | 皇軍將兵與軍馬的武軍長久祈願 | 皇奉(皇民奉公會) | 各州廳畜產會 | |
| 學校 | 在朝會期間訓話、感謝及祈 | | | |

[34] 〈愛馬行進實施〉、〈愛馬の夜實施計畫案〉，《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8年第五號，頁16-17。

[35] 〈第五回愛馬の日を迎へて〉，〈愛馬の日に際して〉，〈台灣と馬產〉，《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8年第五號，頁2-11。

[36] 〈決戰下の馬產強化〉、〈昭和十八年愛馬の日行事實施概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8年第五號，頁11-14。

C.E.P.S.

| | | | | |
|---|---|---|---|---|
| | 念。發送軍馬慰問文。 | | | |
| 印刷物 | 1. 新聞(記事寫真)<br>2. 新建設寫真通、台灣時報及其他<br>3. 卡片(ボスター)<br>4. 窗寫真 | 情報課<br>皇奉 | 台畜(台灣畜產會) | |
| 愛馬行進 | 必勝祈願行進 | 各州廳畜產會 | 軍<br>州廳 | 依各地實情實施 |
| 供覽 | 軍馬的演習 | 軍 | | |
| 放送 | 1. 關於馬事思想普及的演講<br>2. 演藝<br>3. 兒童時間<br>4. 其他 | 情報課 | 農務課<br>放送協會 | |
| 展示 | 展覽會店頭裝飾 | 皇奉 | 商工會議所 | |
| 奉仕 | 愛馬奉仕 | 大日本婦人會 | | |
| 電影館等 | 馬事關係電影的放映<br>在電影館內懸垂相關印刷品 | 情報課 | 興業統制會社 | |
| 表彰 | 關於馬事的有功者及善行者 | 各州廳<br>畜產會 | | |
| 換氣清掃的實施 | 丁舍<br>馬驥場<br>飲水場<br>馬牧場<br>作業場 | 畜產會 | | |
| 飼養管理 | 馬具、丁具的 | 各州廳 | | |

C.E.P.S.

| | | | | |
|---|---|---|---|---|
| | 負責人<br>馬體負責人改裝削蹄<br>日光浴運動<br>青草的清淨及給水<br>鋪設清潔的寢處 | 畜產會 | | |

此外，上表未提及尚有愛馬之夜活動的舉辦，愛馬之夜在 4 月 7 日午後 7 時開始，場所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的順序是致開會辭、國民禮儀、問侯、表演最後是閉會。表演的內容有日本音樂、劍舞及日本舞蹈等三項[37]。

基本上各州廳均依上表愛馬日活動行事實施要領，對各項活動各有不同的計畫及活動內容。

從上表可看出愛馬日的活動項目相當多采多姿，並且從白天到晚上皆安排了各種不同的活動，而必須負責推廣馬事思想關係機關，從軍部、各州廳皇奉支部、各州廳畜產會、各州廳政府、農務課、放送協會、商工會議所及興業統制會社等，可說是動員的層面相當廣泛。

在日本進入戰時體制，台灣在戰爭動員的體系之下，為了翼贊因戰爭而需要的軍馬，台灣總督府不惜花費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動員各種政府及民間的機關、團體及民眾，而為了就是培養各種關於馬事的戰爭意識。

[37] 〈愛馬行進實施〉、〈愛馬の夜實施計畫案〉，《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8年第五號，頁17。

### (三)軍馬祭

軍馬祭的實施是爲了祭祀在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中犧牲的軍馬。在日本內地是從昭和 13 年(1938 年)開始，由帝國馬匹協會、日本競馬會、大日本騎道會、軍用馬匹鍛鍊中央會主辦了第一回軍馬祭，昭和 14 年(1939 年)，舉辦了第二回軍馬祭。而台灣在日本內地的影響之下，昭和 14 年(1939 年)也開始實施第一回軍馬祭，由各州廳畜產會負責主辦[38]。

昭和 14 年，台灣舉辦了第一次的軍馬祭，10 月 24 日，台北州的軍馬祭由畜產會主辦，在台北市新公園舉行，台灣總督府、台灣軍、台北州以及台北市各後援團體皆出席參加，重要的人物有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兒庄軍司令官、森岡總務長官、大津參謀長、總督府各部局長、軍各部長、府評議員、台北州會議員、市會議員、郡守、街庄長等。台灣畜產會並且印製了一本《送られし馬に心あり》的小冊子，在祭祀會場的入口向各團體發送，希望民眾讀了之後，能夠增加對馬的知識[39]。

此外，台灣畜產會請台北放送局在軍馬祭當天，播送關於軍馬的音樂及歌謠曲等。晚間七時四十分，在軍馬祭當天祭祀完畢之後，由台灣總督府殖民局長田端幸三郎，透過台北放送局向全島放送關於軍馬祭的行事，並且說明軍馬祭的意義，表明 10 月 23 日是例行靖國神社大祭的日子，

---

[38] 〈支那事變軍馬祭の概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5年第十一號，頁58。

[39] 〈支那事變軍馬祭祭典概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4年第十一號，頁96-97。

C.E.P.S.

祭拜靖國神社是祭祀日本戰死的軍人，而 24 日祭拜軍馬則是要向無言的勇士致敬，並且藉此機會希望全島全力協助馬政計劃的遂行[40]。

昭和 16 年(1941 年)的軍馬祭，爲配合日本中央，延到了 10 月 31 日舉行。此次是由長谷川清總督擔任主祭，參加的團體包括了軍部、武德會、台灣學生馬術聯盟以及其它各種乘馬團體。此次軍馬祭較特別的是台灣畜產會利用此次機會發佈傳單，呼籲民眾能夠參與馬糧、茶穀獻納運動，以翼贊日本軍事行動的需求[41]。

昭和 18 年(1943 年)10 月 23 日，宮本佐市在軍馬祭前夜，於台北放送局透過廣播，宣導馬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並且講述了日本馬的歷史，希望能夠進一步加強第一次馬政計劃的實施[42]。

## 四、 結論

日治時期台灣「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形成的因素，以及進行的實況已如上述，而對於這三個在日治時期台灣的紀念日，是否有進一步的意義，或許可從一些後殖民理論的看法思索此一問

---

[40] 〈支那事變軍馬祭祭典概況〉，《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4年第十一號，頁1-4。

[41] 〈台北州支那事變軍馬祭〉，《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6年第十二號，頁80-81。

[42] 台灣畜產會，〈軍馬祭〉，《台灣畜產會會報》，昭和18年第十一號，頁50。

C.E.P.S.

題，並且將嘗試以其來詮釋本文的主題。

薩依德在其《東方主義》這本書中，探討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家及人民，如何形塑了關於東方的印象及看法，並進而批判了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誤解。而在《東方主義》之後，薩依德的另一本鉅作《文化與帝國主義》則是延續其對西方霸權的又一批判之作，其重點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威權及其餘緒加以鋪陳，顯出帝國主義作爲普遍的文化領域，充斥著特殊的政治、意識型態、經濟、社會力道，並在那些受殖民主義控制的地區進行知識編碼和製造。這兩本書可以說都是一種關於殖民話語的研究，也是薩依德自稱從傅柯的關於權力、知識的理論中汲取養分，所形成的後殖民研究。

薩依德《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的殖民話語是對殖民地的人民而言，如何使受殖者產生某種知識符碼，這方面的後殖民研究成果如敏米所寫的〈殖民者與受殖者〉[43]、彼埃特思、巴域(Jan Nederveen Pieterse & Bhikhu Parekh)所寫的〈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後殖情狀」〉[44]等，皆是著重討論帝國主義如何對殖民地的人民進行知識編碼和製造。其中敏米在其〈殖民者與受殖者〉一文中認爲，殖民者自己對殖民地形勢的分析比別人更爲縝密，可能也更爲清晰，因爲他無論做甚麼，都以不可

[43] 敏米著，〈殖民者與受殖者〉收在《解殖與民族主義》一書，頁1-28。

[44] 彼埃特思、巴域(Jan Nederveen Pieterse & Bhikhu Parekh)著〈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後殖情狀」〉，收在《解殖與民族主義》一書，頁101-128。

能有甚麼新的關係模式爲出發點，以此決定一切舉措。他擔心任何讓步都會構成威脅，於是想盡辦法鞏固和維護殖民制度[45]。

我們若以上述的看法來看日治時期的台灣，或許也可以適用。亦即日本在台灣爲維護其殖民利益，並且統治者－受殖者這樣的關係模式是不變的，在不變的情況之下必定要對殖民地必定要進行知識編碼和製造。而台灣做爲殖民地，對日本在台灣進行的知識編碼及製造，基本上只能被動的接受。因爲台灣人民做爲一個受殖者，非常明白本身是被被馭的階級。敏米認爲被駕馭的階級一旦接受這一意識形態，也就實際上接受了自己所分配到的角色。這可以解釋許多問題，其一就是爲甚麼社會得以相對安定，而被壓迫者不管願意與否都忍受著壓迫[46]。

而日治時期日本在台灣所進行的知識編碼和製造，或許可以同化政策或皇民化政策爲代表，日本統治台灣大約從 1918 年就走向同化政策的道路，但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最多只是一個趨勢，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台灣從來沒有真正與日本本土制度一致過。此一「內地延長主義」基本上歧視、壓迫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與延續，相對而言，對台灣住民權益的提升，則居於次要的地位[47]。因此這樣的政策最終必然是要走向失敗的道路，誠如敏米所說的：「同化政策本有其可取的一面，特別是其隱含的大同理念和社會主義色彩，更是值得尊重的理想。然而現代實行殖民化

---

[45] 敏米著，〈殖民者與受殖者〉收在《解殖與民族主義》一書，頁1-28。

[46] 敏米，〈殖民者與受殖者〉收在《解殖與民族主義》一書，頁7。

[47] 薛化元編著，《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修訂二版)。

的地方顯然沒人喜歡同化，即使共產主義者也不熱衷。其實同化也是與殖民化的本義相違的，同化的結果會消除殖民者與受殖者的區別，並因此而消除殖民關係。」「要使受殖者的同化既有目的又有意義，就要使同化惠及整個民族，亦即是要使殖民地的情況完全改觀。然而除非摒棄殖民與受殖民的關係，否則殖民地的情況是不可能改變的。」[48]

本文所所思索重點也正是在此，而「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或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如果說日本在「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有進行所謂的知識編碼和製造，那麼從本文來看可以歸納出有三個具體的過程。

一是在台灣民眾一般日常生活的行事當中，加入了三個關於馬事的日子，使人民在日常行事中習慣有馬事的生活。

二是在遊行活動當中，製造認同的意識，這個殖民者欲製造的認同，與美式遊行的認同有很大的差異。萊恩(Mary Ryan)在〈美式的遊行：十九世紀社會各界的再現〉一文中，探討了遊行在美國所發展出來獨特的型態，包括遊行在城市中的路線(都會文化的形構)、美國各個族群的遊行團體所形成的社會認同等等，此種遊行與本文主旨「建國祭」及「愛馬日」中的遊行活動，形成明顯的對比，亦即美式的遊行是從民眾本身發起的，並且形成某種族群社會的認同。但是日治下「建國祭」及「愛馬日」中的遊行，則是官方發起的活動，其目的也是要是產生「認同」的意識，只不

[48] 敏米所寫的〈殖民者與受殖者〉收在《解殖與民族主義》一書，頁25及頁12。

C.E.P.S.

過此種認同是殖民者希望受殖者對其殖民母國產生認同，也就是母國爲了戰爭的目的，希望透過遊行活動讓受殖者產生馬事思想的意識形態，並進而翼贊母國的戰爭行動，而這也就是在「皇民化政策」之下，日本對台灣眾多意識形態製造的一種。

三是配合戰爭動員體系，將馬的生產獎勵及馬事思想的普及，做爲戰爭意識培養的一環來實施。

這三個具體的過程或許可以看出「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是日本對台灣進行知識編碼和製造的其中一項措施，並且從而顯現如同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所表達的意義。

(本文於 2004.3.5 收稿，2004.4.16 通過刊登)

## 參考書目

### (一)專著及檔案材料


1.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
2. Edward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縣：立緒文化，2001年，初版。
3. 張京媛著，《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初版。
4. 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文化，2000年，初版。
5. (美)賽義德（Edward Said）等著、陳永國等譯，《後殖民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


C.E.P.S.

6. 盧建榮著，《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初版。
7. 盧建榮主編，《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初版。
8. 林・享特(Lynn Hunt)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初版。
9. 張京媛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3年，初版。
10. 盧建榮主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初版。
11. 台灣總督府警察編，吳密察解題，《台灣總督府警察府沿革誌》，台北市 ： 南天，1995，初版。
12. 創造社編，《台灣社會運動史》，一至五冊，台北：創造社，1986年，第一版。
13. 蔡培火等撰，《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民72，三版。
14. 林繼文著，《日本據台末期： (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台北縣：稻鄉，民85，初版。
15. 薛化元編著，《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修定二版。
16.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9月，初版。
17. 呂紹理著，《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年，初版。
18. 白井朝吉、江間常吉著，《皇民化運動》，臺北市：東臺灣新報臺北支，昭和14[1939]年。
19. 台灣畜產會編，《台灣畜產會會報》，台北：台灣畜產會，昭和13年至

18年。

20. 台灣畜產協會編，《台灣之畜產》，台北：台灣畜產協會，昭和8年至13年
21. 台中州畜產會編，《台中州畜產會會》，台中：台中畜產會，昭和13-16年。
22. 台灣畜產會編，《台灣畜產會收支預算書》，台北：台灣畜產會，昭和14年。

## (二)期刊論文

1. 呂紹理著，〈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未刊稿。
2. 呂紹理著，〈從《台灣人士鑑》看日治時期社會領階層的休閒傾向〉，未刊稿。
3. 江智浩著，《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桃園縣中壢市：撰者，民86年，初版。
4. 鄭麗玲著，《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新竹市：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一般史組，民83。

C.E.P.S.

# The Formation and Implement of "Horse March in New Era Inauguration Festival," "Horse Day" and "Military Horse Memorial Day"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1936-1945

Chen-feng Tai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orse March in New Era Inauguration Festival(建國祭－kenkokusai, or 紀元節－Kigensetsu)," "Horse Day(愛馬日－Aibabi)" and "Military Horse Memorial Day(軍馬祭－Gunbasai)" were Japanese festivals arranged in Taiwan by Japan government during its rule over Taiwan.

"New Era Inauguration Festival" fell on February 11th. It was the day on which Japan celebrated its national establishment. In Taiwan, Japan government also held New Era Inauguration Festival as a national holiday. At the ceremony of this festival, there was no activity of Horse March in the beginning. However, it was included in 1939 whe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broke out,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first horse policy, which spread the idea of horse affairs and encouraged the breeding of horses in Taiwan society.

"Horse Day" fell on April 7th. Its enforcement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04 for the reason that Japan started to recognize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horses in battlefields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After Horse Day was put into practice in 1904, Japan started its first 30-year horse policy in 1906. In Taiwan, Horse Day was served as a part of the improvement of horse breeding project. However, its function wasn't fully developed before World War II. Only until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did Horse Day was enforced a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Mobilization Movement. Moreover, Horse Day reached its prime era in 1939 as a national holiday advocat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 Horse Race, the Association of Empire Hors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 Horse and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nd the Central Alliance of the National Spirit Mobilization Movement.

The purpose of the enforcement of "Military Horse Memorial Day" is to hold a memorial ceremony for military horses that died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 first ceremony began in 1938 and was held by the Association of Empire Horse,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 Horse Race, the Great Japanese Horsemanship Society, and the Central Department for Military Horse Training. The second ceremony took place in 1939, with Taiwan having its first Military Horse Memorial Day on October 24th in the same yea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

In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adopts the approach and theory of post colonialism to clarify and interpret the theme of the article in order to find out further meanings of these three Japanese festivals.

C.E.P.S.

**Keywords: Horse March in New Era Inauguration Festival, Horse Day, Military Horse Memorial Day, post colonialism**